

文学与社会： 明清小说名著探微

文史哲编辑部 编

文史哲丛刊

-53

 商务印书馆

文史哲丛刊

-83

文学与社会： 明清小说名著探微

文史哲编辑部 编

I207.41
W400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社会:明清小说名著探微/文史哲编辑部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文史哲丛刊)
ISBN 978-7-100-06424-8

I. 文… II. 文…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明清时代—文集 IV. I20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09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学与社会:明清小说名著探微
文史哲编辑部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424-8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定价:26.00 元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问 孔 繁 刘光裕 丁冠之

韩凌轩 蔡德贵 陈 炎

主 编 王学典

副主编 周广璜 刘京希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建 王学典 刘 培 刘京希

李 梅 李扬眉 宋全成 陈绍燕

范学辉 周广璜 贺立华 曹 峰

出版说明

《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起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行,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先生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3年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之一,迄今已走过六十年的历史行程。

由于一直走专家办刊、学术立刊之路,《文史哲》杂志甫一创刊便名重士林,驰誉中外,在数代读书人心目中享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她所刊布的一篇又一篇集功力与见识于一体的精湛力作,不断推动着当代学术的演化。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这份杂志密切相关。《文史哲》杂志向有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将文章按专题结集成册的历史与传统:早在1957年,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以“《文史哲》丛刊”为名,推出过《中国古代文学论丛》、《语言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今者编辑部再度与商务印书馆携手,推出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所收诸文,多为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望学界垂爱。

文史哲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0月

目 录

《水浒传》和《宋史》	华山 1
《水浒》的现实主义——“论《水浒》”之一	李希凡 20
《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王学泰 52
论《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的对立	陈漱 77
也谈《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的关系 ——兼答陈漱同志	赵明政 94
再谈《西游记》中神魔的对立	陈漱 108
《金瓶梅》平议	袁世硕 116
《金瓶梅》泛解	何满子 134
论《金瓶梅》悲剧的社会意义	朱俊亭 140
略谈《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蓝翎 150
试论《聊斋志异》妇女形象中人性的异化	赵俪生 162
《聊斋》志怪艺术新质论略	袁世硕 173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李希凡、蓝翎 186

《红楼梦》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 兼谈考据〔日〕琦书畊 202
- 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 吴大琨 206
- 略谈《红楼梦》的人物语言
- 以王熙凤语言作例 殷孟伦 216
- 略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
- 评吴大琨先生的几个论点 陈湛若 242
- 关于《略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及其他
- 答陈湛若先生 吴大琨 273
- 关于《略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及其他》一文的
- 补充 吴大琨 281
- “真”“假”观念与“梦”“幻”世界
- 《红楼梦》艺境探微 李希凡 292
- 弗莱理论与《红楼梦》艺术结构 韩加明 314
- 后记 329

《水浒传》和《宋史》

华 山

《水浒传》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的伟大杰作；它的历史真实性，久已成为学者们所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原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研究：第一方面是以宋代历史来研究《水浒传》，即以《宋史》证《水浒传》；第二方面是以《水浒传》来研究宋代历史，即以《水浒传》证《宋史》。这两方面都有研究的必要。本文是第一方面的研究，即以《宋史》证《水浒传》；至于第二方面的研究，因为目前尚有若干问题未曾获得解决，姑俟诸异日。

张政烺先生曾有《宋江考》一文，载《历史教学》1953年1月号，对于宋江的事迹，已有详细考证，其中论点，作者大部分都能同意。因而在本文中对张先生已经提出的问题，不再加以论述，以免重复。张先生的原文俱在，读者自可参看。

一、关于梁山泊

水浒英雄们的活动根据地是梁山泊。梁山泺，也叫张泽泺，古称钜野泽，现在久已淤填干涸，成为平陆（据到过山东的朋友说，尚有遗迹可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引《清一统志》，梁山泊在今山东省寿张县东南梁山下，查《山东通志》东平县的地图，梁山正在东平与寿张之间。《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传》：“郓介梁山泺，素

多盗，宗孟痛治之。”郓州即今山东东平县，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改郓州为东平府，寿张县即属东平府管辖。那么宋代的梁山泺应该就在现在的东平与寿张两县之间。

据《水浒传》的描写，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第十一回)，这可能夸大了些；但宋代的梁山泺确为京东一巨浸，这是毫无疑问的。《宋史·河渠志二》：“熙宁十年(1077)……七月，(河)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两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郛、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这是黄河南北分流的开始。因河水汇入，水泊更比以前广大。《宋稗类钞》卷二十六载下面一则故事：

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刘贡父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献策曰：“梁山泺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顷，但未择得利便之地贮其水耳。”介甫俯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贮如许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泺，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又《宋史》卷四六八《杨戩传》：

梁(原文作“筑”，误，应作“梁”)山泺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

“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顷”，“绵亘数百里”，宋时梁山泊的面积之大，可以想见。

由于地理形势，梁山泊从古便成为农民起义军的根据地，汉初大功臣彭越就是从这里开始起义的。《汉书·彭越传》说：

彭越，字仲，……常渔钜野泽中为盗。陈胜起，或谓越曰：

“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越，请仲为长。

《宋史》中提到梁山泊的时候，也往往说它多“盗”。

如前引《蒲宗孟传》：

逾年，加资政殿学士，徙亳、杭、郢三州。郢介梁山泺，素多盗。

《宋史》卷三五三《许几传》：

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

又卷三五六《任谅传》：

（徽宗时任谅）提点京东刑狱。梁山泺渔者习为盗。

又前引《杨戢传》：

筑（应作“梁”）山泺，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郢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

在这些“盗”中，是不是有阮氏三雄在内？我们无确证可据。

到北宋末年，金人南下之后，梁山泺又变为人民抗敌义军的根据地。如《金史》卷八十《斜卯阿里传》：

天会六年（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伐宋主。……

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

再如《三朝北盟汇编》卷一四三载：

张荣，梁山泺取鱼人也。聚梁山泺，有舟师二三百人，常劫掠金人。杜充为（东京）留守时，借补荣官至武功大夫、遥郡刺史。军中号为“张敌万”。

后来张荣曾率军南下，入兴化缩头湖，于绍兴元年（1131）三月大败挾懒军，俘馘五千余人。金军“锐气沮丧”，“军中每夜无故而惊”，（《大金国志》卷七），狼狈北遁。

这便是历史上的梁山泊。现在的问题是：宋江等和梁山泊的关系究竟如何？

按《宋史》中关于宋江的记载，只有三处：《徽宗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但没有一处曾提到梁山泊。最早提到宋江等和梁山泊的关系的似乎是《宣和遗事》。但《遗事》的作者却把梁山泊的位置搬上了太行山，可见他并没有弄清宋江等到底在何处落草。在这里明白地透露出《遗事》的作者和后来《水浒传》的作者们把宋江等和南宋初年太行山忠义军扭合在一起的显明痕迹。

有几个理由使我们相信：宋江等英雄们即使曾经和梁山泊发生过若干关系，但绝没有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曾在那里建立过水寨，做过长期的根据地。第一，就是前面说过的《宋史》中三处有关宋江的记载，没有一处提到过梁山泊；第二，《张叔夜传》说：“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可知宋江的最早起义地点是在黄河以北，而梁山泊却在黄河以南；第三，宋江似乎采取了“流寇式”的流动战术，起义时间很短（从宣和元年末到宣和三年初，总共不过一年

多),而转战千里,马不停蹄,绝不至于在一个地点做长期固守,坐待官军的“围剿”;第四,宋江起义人数很少,即使不一定始终是三十六人,但绝不会超过数百。以这样少的人,即使“其才过人”(《侯蒙传》),也绝不可能把守住周围数百里的梁山泊。

宋江等没有在梁山泊结寨,那是没有疑问的。

二、宋江三十六人何以能横行齐魏

《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卷三五三《张叔夜传》亦说:“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仅仅以三十六人而能横行千里,官军数万无敢与抗,即算是“其才过人”,但到底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问题是在两方面:其一是宋江部下是不是始终只有三十六人?其二是所谓“官军数万”这句话有没有问题?若说真有数万官军,这些官军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军队?

先谈第一个问题。据张政烺先生的意见:“宋江只有三十六人,并不像元曲里所说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更不像小说里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这个说法,我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未免机械了些。北宋一代,起义次数很多,但除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如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等)之外,大概规模都很小,人数一般不过几十人到几百人。仁宗时代在西夏用兵之后,起义特多,仅仅庆历三年(1043)一年之间的起义,见于《欧阳修文集》者,已经不胜枚举(《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九七、九八、一百、一百一)。其中有数字可见的如:

王伦,初起时仅四五十人,后来发展到二三百人。

张海、郭邈山，二百余人。

桂阳监、夔、峡，荆湖“蛮贼”各数百人。

滑州“贼”三十余人。

许州“贼”三四十人。

光化军叛卒二三百人。

兴州“贼”八九十人。

建昌军“贼”四百人。

没有一处超过五百人以上，可见都是些小规模起义部队。以此推知宋江起义不过三十六人。但这或许是初起时人数，他们既“转略十郡”，不可能一点儿没有发展；但最多不会超过几百人，所以张叔夜能够以一千兵收降了他。像元曲《水浒》所写除一百单八将个个英雄之外，更有几万喽啰，那无疑是说话艺人和作者们的创造和幻想。

既然宋江起义人数不过几十几百，那么怎能“转略十郡”、“横行齐魏”而“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呢？这绝不可以单从“其才必过人”一点来说明，而主要是要从北宋中叶后军政腐败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宋代自赵匡胤开国以来，其一贯的政策是：对外屈辱，专力防内。为了达到消灭内部反抗势力的目的，他把地方的政权、财权和兵权都收归中央，收到皇帝手里。在首都开封，集中着全国最精锐的军队，号为禁军，而把老弱残兵留在地方，号为厢军。开国时全国兵数仅 16 万人（见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九“添兵”，而张方平则云不足 15 万），大概都经精练，兵虽少而皆可用。其后兵数渐多，质量渐差。到仁宗庆历年间，全国兵数乃达到 125.9 万（内禁军 82.6 万）的巨额数字！（见《宋史》卷一八七《兵志》，而王明清

《挥麈录》则谓皇祐初兵 140 万,更超过此数)。这庞大的军队,成为当时财政上的最大漏卮(养兵费大约占全部国家岁入的六分之五)。统治者竭取了民膏民血,养了这么多兵,但并没有受着多兵的好处。厢军固不必说,就是禁军,也毫无战斗力可言。北宋对契丹战争,八十一战中仅获一胜(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五)。仁宗时对付一个西夏小国,竭天下之力,最后还是以岁“赐”大量银绢茶叶买得暂时和平。欧阳修有《原弊》一文,说明了当时的军政状况:

国家自景德罢兵(1005),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几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十,《文献通考》卷一五二节引)

王安石变法,大减冗兵,想以保甲民兵逐渐代替募兵,阙额不补,所以兵数少减,然而熙宁元丰间,内外军合计尚在八十万以上。经过了一番整顿选汰,并加强了训练之后,兵势稍振,所以当时南北用兵,每得胜利,可说是宋代兵力最强的时期。元祐之后,一切复旧,兵弊日滋。元祐八年(1093)苏轼奏疏河北一带边防重地的禁军状况说:

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稍弛,将骄卒惰,缓急不可用。……今者河朔沿边诸军未尝出征,终年坐食,理合富强。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仪、孙敏行亲入诸营,按视曲折,审知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体问其故,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为风。将校既先违法不公,则军政无缘修举,所以军

人例皆饮、博、逾滥(按谓犯奸),三事不止,虽是禁军,不免寒饿,既轻犯法,动辄逃亡。……骄情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东坡奏议》卷十四《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

这种兵要他们巩固国防,当然完全说不上。这还算是禁军,至于地方厢军,更不用说。人数既少(大概只占禁军的半数,又分散在各州县),又多老病,平时毫无训练,“给役而已”,性质上近于官奴,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地方武力既弱,一旦有小股起义军,就无法对付,往往要求中央发兵,曾巩《元丰类稿》卷五九云:

宋兴,既敛兵于内,盗贼辄发,而州郡无武备,急则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为适然。故盗起辄转劫数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

在这样的军政情况之下,只要有几十个强悍猛勇之士,便可以组织起义。宋代起义甚多,而且大多规模很小,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徽宗之后,蔡京等民贼主政,君臣狼狈,托言新法,加强剥削,以供他们的无耻挥霍。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大崩溃的前夕。内部则农民起义蜂起,外部则外患严重。结果,以宋徽宗赵佶为首的一群无耻民贼,竟把半个中国断送在异族人手里。

在这些民贼之间,童贯和高俅——两个《水浒传》中的反派人物——对于军政的彻底破坏,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关于童贯,《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说:

童贯握兵,势倾内外。凡遇阵败,耻于人言,第申逃窜。

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住招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

《宋史》高俅无传，其出身本末，见于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中云高俅以善蹴球见宠，即为《水浒传》第二回的蓝本。《宋史·徽宗纪》：“（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水浒传》中称高俅为高太尉，亦与史传相符。宣和七年（1125）金兵大举南下，徽宗禅位，逃亡东南，高俅率禁卫兵扈从“有功”，靖康元年（1126）三月“以检校少傅奉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进封简国公”（见《靖康要录》卷三，《宋史·钦宗纪》不载），不久（五月）死。徽宗时自“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挥麈后录》），兄弟子侄，俱为大官，“恩幸无比，极其富贵”（同上）。被当时人认为“六贼”之一（见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二。六贼有二说，一说无高俅）。《靖康要录》卷七载高俅死后臣僚上言：

高俅初由胥吏，遭遇寅缘幸会，致位使相，检校三公，不思竭力图报，乃敢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

在这样极端腐败的军政之下，宋江以三十六人“转略十郡”、“横行齐魏”，便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三、《水浒传》中几个历史人物

《水浒传》人物除开几个反派人物，如蔡京、童贯、高俅等在史传中皆可考见之外，梁山泊中的好汉们，其历史真实性，就很成问题。我们知道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英雄事迹，在当时和后世，已成为普遍流行的传说，并且成为南宋时说话人的说话资料。流传既久，就不免有许多附会和夸大，逐渐失去其真相。张政烺先生在《宋江考》一文中已经指出说话人怎样把南宋初年山水寨忠义军的首领拉进宋江集团的经过。但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加以考察：《水浒传》不仅拉进了忠义军首领们，并且也可能把前于宋江的起义军领袖们搬上了梁山泊。譬如据《水浒传》所说，在晁盖等上梁山之前，水泊中已有王伦一伙人在内占据着，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暗射庆历中王伦一伙的起义军首领。

关于王伦起义，《宋史》记载极为简略，仅在《仁宗纪》中写着：“（庆历三年五月）虎翼卒王伦叛于沂州（按，应为‘沂州’之误）。……（七月）乙酉，获王伦。”王伦起义的主要史料，保存在《欧阳修文集》中，《文集》卷九八《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劄子》云：

近闻沂州军贼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仍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窃知王伦在沂、密间，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邮，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驱胁。

又同卷《再论王伦事宜劄子》：